



中国翻译文学史稿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文 屏
责任校对：李玉英

中国翻译文学史稿
(陈玉刚主编)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4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3 印张 字数 335 (千)

1989年8月第一版 1989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4.20元

ISBN 7-5001-0072-8/H·22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编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发展（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	21
第一章 概述	21
第二章 中国早期的翻译机构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翻译活动	30
第一节 翻译机构的建立和同文馆的活动	30
第二节 其他翻译机构	32
第三节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翻译活动	34
第三章 梁启超的翻译活动与贡献	37
第一节 梁启超的生平	37
第二节 梁启超的翻译活动及贡献	41
第四章 严复的翻译活动与贡献	45
第一节 严复的生平	45
第二节 严复的翻译活动及贡献	48
第五章 林纾的翻译活动与贡献	58
第一节 林纾的生平	58
第二节 林纾的翻译活动及贡献	66
第六章 中国近代其他翻译文学家的活动与贡献	76
第二编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发展的初期（从1915年新青年社到1930年“左联”成立）	89
第一章 概述	89

第二章	新青年社的翻译活动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历史的发端·····	103
第一节	新青年社的翻译活动及其作用·····	103
第二节	《新青年》“易卜生号”的影响·····	109
第三节	《新青年》翻译文学的特点及其历史传统·····	112
第三章	文学研究会与外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翻译和介绍·····	116
第一节	文学研究会的翻译活动及其倾向·····	116
第二节	《小说月报》发表的“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刊·····	121
第三节	文学研究会对外国文学的介绍与研究·····	123
第四节	文学研究会翻译文学的特点·····	126
第五节	文学研究会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影响·····	128
第六节	文学研究会其他翻译家的活动和贡献·····	130
第四章	创造社与外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翻译和介绍·····	137
第一节	创造社的翻译活动及其倾向·····	137
第二节	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关于介绍、翻译的一场论争·····	146
第五章	未名社的成立与中国翻译文学发展的新趋势·····	150
第一节	未名社的成立与以翻译为己任的翻译文学队伍的初步形成·····	150
第二节	鲁迅与未名社·····	159
第六章	鲁迅的翻译活动与贡献·····	164
第一节	鲁迅的生平和翻译活动·····	164
第二节	鲁迅的翻译理论·····	171
第三节	鲁迅的主要译作：《域外小说集》、《毁灭》、《死魂灵》·····	178

第四节	鲁迅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杰出贡献·····	185
第七章	茅盾的翻译活动与贡献·····	188
第一节	茅盾的生平和翻译活动·····	188
第二节	茅盾的翻译理论·····	194
第三节	茅盾对翻译文学事业的贡献·····	200
第八章	郭沫若的翻译活动与贡献·····	203
第一节	郭沫若的生平和翻译活动·····	203
第二节	郭沫若对外国戏剧的翻译·····	207
第三节	郭沫若翻译文学的特点和贡献·····	210
第九章	巴金的翻译活动与贡献·····	214
第一节	巴金的生平和翻译活动·····	214
第二节	巴金与俄国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的翻译和介绍·····	217
第三节	巴金对翻译事业的贡献·····	218
第三编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发展的中期（从1930年“左联”成立到1937年抗战开始）·····	223
第一章	概述·····	223
第二章	“左联”与翻译文学的发展·····	234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	234
第二节	苏联及其他各国进步文学作品的翻译·····	237
第三章	瞿秋白的翻译活动与贡献·····	241
第一节	瞿秋白的生平与翻译活动·····	241
第二节	对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	251
第四章	其他翻译文学家的活动与贡献·····	258
第五章	翻译理论的讨论与研究·····	268
第一节	翻译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268
第二节	鲁迅和瞿秋白关于翻译问题的讨论·····	270
第三节	林语堂的《论翻译》·····	273
第六章	《译文》和《世界文库》·····	279

第一节	《译文》的创办及其对发展翻译文学的作用	279
第二节	《世界文库》的出版及其影响	282
第四编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发展的后期（从1937年抗战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289
第一章	概述	289
第二章	上海“孤岛”时期的文学翻译活动	296
第一节	上海“孤岛”的翻译简况	296
第二节	朱生豪与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	298
第三节	梅益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301
第四节	李健吾及其翻译	304
第三章	国统区的文学翻译活动	307
第一节	国统区的翻译简况	307
第二节	傅雷与巴尔扎克小说的翻译	312
第三节	戈宝权与普希金诗歌的翻译	315
第四节	方重与乔叟诗的翻译	318
第五节	其他翻译文学家的活动与贡献	319
第四章	解放区的文学翻译活动	326
第一节	解放区翻译活动简况	326
第二节	肖三及其翻译	328
第五章	革命翻译文学团体——时代出版社的成立及其贡献	332
第一节	时代出版社的成立及其翻译文学活动	332
第二节	姜椿芳及其对苏联文学的翻译	335
第三节	其他翻译文学家的活动与贡献	338
第四节	时代出版社的贡献	341
第五编	中国当代翻译文学（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	345
第一章	概述	345

第二章	对亚非拉各国文学的翻译·····	353
第三章	对俄国和苏联文学的翻译·····	359
第四章	对欧美各国文学的翻译·····	371
编后记	·····	404

绪 论

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了不同的民族，各民族具有了自己的语言，不同的民族语言派生出不同的语系，各种语系产生了许多支派，这时，为了相互交往，表达感情，交流文化，人类社会就出现了翻译。可以说，翻译的历史是和民族之间用语言作工具进行交际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一同起步的。我国的翻译历史极为久远，先秦和汉代的古籍中已有关于翻译的文字记载，如《尚书·归禾篇》：“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越裳以三象重久译而献白雉。”《周礼·秋官司寇》记有：“掌蛮狄诸国传谕言辞”，“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礼记·王制》记有：“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西汉时设有“译长”和“译使”的官职；西汉刘向的《说苑·善说》中也有关于鄂君子皙请人翻译《越人歌》的记述。但是，我国古代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翻译，则是由宗教宣传的需要，而以翻译佛经开其端倪的。

佛教，大约于西汉末年就传入我国，据《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资料记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此经应是我国最早的佛经翻译本。东汉初期，在我国河南洛阳建立了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公元67年，即我国东汉明帝永平十年，有中天竺（今印度）僧侣摄摩腾和竺法兰来到白马寺讲授佛教教义并从事佛经的翻译；他们翻译了《四十二章经》、《佛本生经》、《佛本行经》等，开创了

我国翻译佛经的事业。

另一位早期的佛经翻译家是安世高。他本名清，安息（古代波斯，今伊朗）人，原是安息国的太子。父王死后，他把王位让给叔父，自己出家事佛。安世高精于小乘经典，并学禅经。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安世高来到我国，在洛阳翻译佛经。二十多年中，他先后译出佛教经文九十五部，一百一十五卷，其中如《安般守意经》、《人本欲生经》、《阴持入经》等禅经，对后来佛学的重要派别——禅观之学的形成与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安世高的译经活动受到普遍的赞扬，《高僧传》称赞他译的佛经是“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为翻译之首”。

三国时期，吴国孙权信奉佛教，礼聘支谦、康僧会等佛学大师在建业、武昌等地从事翻译佛经活动。计从孙权黄武二年到孙亮建兴二年（223-253）的三十年间翻译出《大明度无极经》、《维摩诘经》、《大阿尼陀经》、《六度集经》等九十五部，一百三十八卷。

西晋时期，月氏僧人竺法护精通多种语言，先后在敦煌、洛阳、长安等地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竺法护的翻译态度严肃认真，“终身译写，劳不告倦”，先后翻译出《光赞般若经》、《正法华经》、《大哀经》等佛经一百七十五部，三百五十四卷。

西晋之后，佛经的翻译工作经久不衰，著名的翻译家辈出，如东晋、前秦时期的法显、道安，后秦时期的鸠摩罗什，南北朝时期的真谛，唐代的玄奘等高僧都对我国古代的翻译事业作出过卓越的贡献。

法显（约337-约422）是我国早期去西方求法的高僧。他于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去天竺取经，回国后在建康（今南京）道场寺译出《大般泥洹经》、《杂藏经》等佛经六部，二十四卷，并著《佛国记》一书。

道安（314-385），本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人。他十二岁时出家受戒，在东晋、前秦时期曾在襄阳、长安等地宣讲佛教教义，主持佛经的翻译工作。他还亲手整理修订流传的佛经新旧译文，编纂佛经目录，对佛经的流传，作出过重要贡献。

鸠摩罗什（344-413），原籍天竺，出生于西域龟兹（今新疆库车）。他从事佛经翻译事业是在后秦时期。后秦弘始三年（401年），后秦国主姚兴遣使把鸠摩罗什迎到长安，待以国师之礼。从此，鸠摩罗什在长安逍遥园里的佛经译场与八百弟子开创了大规模的译经工作，系统地介绍了佛学的思想体系。鸠摩罗什主持译出的佛经共有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据《开元释教录》所载），其中《摩诃般若》、《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马鸣菩萨传》、《龙树菩萨传》等，对佛学思想在我国的流传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所翻译的《金刚》、《法华》、《维摩诘》等佛经经文中包含很多富有戏剧性的故事，曾是我国文学家、画家、雕塑家的作品中常用的典故和题材。鸠摩罗什的翻译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主持翻译的佛经，晓畅明白，首尾贯通，质量较高。鸠摩罗什以前，翻译佛经多用直译法，从他开始尝试意译佛经。他译的经文曾被誉为“其文约而旨，其旨婉而彰”。作为杰出的翻译家，鸠摩罗什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在我国翻译史上是永垂不朽的。

真谛（499-569），古印度西部优禅尼国人。他受梁武帝之聘，于中大同元年（546年）来到中国，正赶上我国北方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他不得不在东南、华南一带从事宗教活动，曾先后流寓于苏、浙、赣、闽、粤等地。他翻译的佛经共有四十九部，一百四十二卷，其中《摄大乘论》对我国佛学思想的发展影响很大。

玄奘（602-664），通称三藏法师，本姓陈，名祜，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玄奘才智过人，学识丰富，

庄诚敬重，意志坚强。他早年不畏艰难险阻，于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远离祖国，到印度留学取经。在印度，他精心潜研佛教哲理，受到尊敬，被印度佛教徒公认为杰出的学者。他在四十四岁时载誉回国，从此埋头著述和翻译佛经。他在长安大慈恩寺主持佛经译场十九年，共译出佛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玄奘对译经工作十分认真，他“常以旧译多缺多误为恨”，对旧译经文的讹误多所订正，所以他翻译的经文被公认为“新译”，而把在他之前译的经文称作“旧译”。玄奘还曾把《老子》一书译成梵文，是早期向国外翻译介绍我国学术著作的学者。玄奘撰写的《大唐西域记》十二卷，是研究中古时期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以及中亚、南亚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书中保存了很多宝贵资料，很有学术价值。

玄奘翻译的佛经，笔法严谨，文采斐然，数量、质量均大大超越前代。他采取直译与意译并用的方法，使行文明白晓畅，流利自然，开创了我国译经史的新纪元，为此他受到“唐朝后译，不屑古人”的称誉。玄奘的另一重大贡献是，他开创了中国人主持译场的先例。在他以前，佛经译场概由外籍高僧主持。自玄奘开始，由他自任译主，译文也是经他亲手写定的优美的汉文。《续高僧传》记载：“自前代以来所译经教，初从梵语倒写本文，次乃回之，顺同此俗，然后笔人乱理文句，中间增损，多坠全言，今所翻传，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玄奘由于在翻译佛经上的卓越贡献和他那种不辞辛苦舍身求法的精神，受到人民的崇敬和怀念，他的轶事在我国人民中间广为流传。

唐代以后，佛经翻译事业逐渐衰落，到北宋仁宗景祐年间佛经译场停顿，元、明、清三代虽然也有人从事译经活动，但其规模已大不如前了。

回顾译经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从东汉以来，我国的佛经翻译事业经历了光辉的时代，所译经文典籍，卷帙浩繁，资料

丰富。这些佛教经文的原文文本有些已经亡佚，现在只有汉文文本存世，之外，我国还保存有藏语和古代其他民族语文的佛教经文。近些年，还在西藏、新疆等地陆续发现了用古代印度语写的佛经文献。这些宝贵资料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佛经翻译工作的伟大成就，在研究和撰写我国翻译文学的历史时应该给予高度重视。

在佛经翻译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我国其他学科的翻译工作也方兴未艾。为政治工作之需，服务于外交的翻译，古已有之。从周代开始，历代中央政府都设有接待外宾的机构和翻译人员，如周代的“行人”、秦代的“典客”、汉代的“大鸿胪”等等。又如西汉张骞及其副使两次出使西域，沟通了汉朝和中亚各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在这类政治性的活动中，离开翻译是不行的。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载：“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在唐代，翻译已经是社会上的一种文化职业，诗人刘禹锡曾写有诗句：“勿谓翻译徒，不为文雅雄”，可见当时社会上对翻译工作的得失已经有所评议了。众所周知，唐代大诗人李白就是一位外交文书的翻译家，关于他的翻译轶事，在我国早有流传，已经家喻户晓。元朝时，由于最高统治者是蒙古人，朝廷谕旨是需要经过翻译才能下达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于1275年来到中国，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他仕元十七年，对中西方语言文化的交流有过重要贡献。明代，朝廷曾专门设立四夷馆，隶属翰林院，选派国子监生学习印度、缅甸、暹罗、蒙古和伊斯兰教国家的语文。清代，先后设立有四译馆、俄罗斯文馆、同文馆，后者规模较大，内部曾开设英、法、德、俄、日等国语文课程，学生学习成绩好的，国家给以奖励并优先录用。这一切都说明，翻译工作一直是我国古代政治、外交工作中的重要环节，受到国家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十六世纪，西方的科学技术开始传入我国。最早从事科技著作翻译的翻译家有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徐光启(1562-1633)，

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历任翰林院检讨、礼部侍郎、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等职。他为官清廉，不同流俗。他出于富国强兵，为人民谋福利的愿望，积极从事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公元1603年，他结识了西洋传教士利玛窦，从此积极向利玛窦学习天文、历法、地理、数学、测量、水利等方面的知识并孜孜不倦地从事翻译工作，把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知识介绍到中国。他和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勾股义》，和意大利人熊三拔合译的《泰西水法》等书，为我国古代的数学、测量学、水利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我国专门的文学翻译工作为时较晚，已属近代之事。但是，从东汉以来的佛经翻译中已孕育有文学翻译的萌芽。佛教经典中包含有深奥的哲学思想，而由于宗教宣传——讲经说法——的需要，佛经中又穿插了许多优美的故事。这些故事富有文学趣味，是极好的文学作品，对我国文学的发展产生过良好的影响。因此，也可以说，从古代翻译佛经开始，我国就产生了翻译文学，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为时较早的。

佛经译文中的文学成分不仅在思想内容上影响了我国文学，而且对我国古代小说、诗歌、戏剧、曲艺等文艺体裁的形成，也起过良好的借鉴作用。唐代的变文、宋代的话本小说以及曲艺中的说唱结合的形式，都曾受到过佛经文学的某些影响。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也是译经大师们首先采用的。他们用白话文体译出的佛经对宋代语录体散文和话本小说的形成起过有益的作用。我国古典诗歌中的调平仄，最初也是受了翻译的佛经的影响，根据汉语的四声而制定出来的，后来，经六朝文人的深入研究和不断运用，才成为我国古代格律诗的重要规则。由此可见，在研究我国翻译文学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时，我们对古代佛经翻译的成就不能不给以应有的重视。

我国纯粹的翻译文学大约开始于十八世纪，而大量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则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当时，中国封建士大夫中的

一些有识之士深感国势积弱，迫切需要富国强兵，而要达此目的，必须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翻译文学就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中兴起的。最早提倡翻译文学的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家梁启超，他于1896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除刊载政治评议、时事新闻外，也刊登翻译小说。严复、夏穗卿在1897年发表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曾提出翻译外国小说的动议。1898年梁启超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明确提出“特采外国名儒撰述，而有关切于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阐述了翻译外国小说的目的与意义。

十九世纪后期，中国社会处于急遽变革之中，由于中国文化革新的需要和进步知识分子的提倡，翻译文学得到了蓬勃发展，这对我国新文化、新文学的建立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诚如郭沫若同志所说：“无论那个民族的文化，在变革时每有外来的潮流参加进来。外国的文化成为触媒，成为刺激，对于本国文化引起质变。”（《再谈中苏文化交流》）我国于“五四”时期兴起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正是和在此前后的翻译文学所起的触媒作用分不开的。

从十九世纪末叶算起，翻译文学在我国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中的发展约略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晚清时期的翻译文学

这个时期，有很多学者提倡翻译文学和从事翻译工作，如梁启超早在1896年就发表了提倡翻译的文章《论译书》，继之又提倡翻译政治小说并亲自参加翻译实践；严复在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方面立下了丰功伟绩，并对翻译标准问题提出了创见；林纾翻译了英、法、德、俄、美、日、比利时、挪威、希腊等国小说一百七十余部，一千多万字；其他如周桂笙、苏曼殊、伍光建等人在翻译文学上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据阿英的《晚清戏曲小说目》统计：从1875年到1911年（光绪元年到辛亥革命，约四十年），翻译小说达六百多部，约占当时出版小说总数的三分之二。很多翻译

家在工作中孜孜不倦，他们的优秀译著，如严复译《天演论》；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块肉余生述》；周桂笙译《新庵谐译》、《含冤花》；苏曼殊译拜伦、雨果的作品；伍光建译《侠隐记》、《续侠隐记》等等，至今仍保持着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在当时和以后都发生过很大影响。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读了林纾等人的翻译小说，才接触到外国文学，对文学发生兴趣，走上了从事文学事业的道路。

我国早期的翻译家们，工作严肃认真，例如严复对译文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林纾虽然不懂外文，但他对原作字句有欠完美之处则努力加以润色、修饰，务使文通字顺，富有艺术性。他们的翻译作品，虽多用古文，但文笔优美，引人爱读。不过，由于这时期中国和外国文化交流还处于近代史上的初期阶段，我国学人对外国文学状况所知甚微，因之对原作的选择有时不甚精审，在翻译图书中也有夹译夹作之现象，其中功过自有定论，但这些早期翻译家们的首创之功是应该永远铭记的。

二、“五四”至1930年的翻译文学

“五四”以后，中国文坛上先后出现了许多文学社团，这些文学团体以及围绕在它们周围的作家们，大都在从事创作、研究理论、编辑刊物的同时也搞些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例如：《新青年》杂志就曾出刊过《易卜生专号》，该刊的编辑刘半农翻译了很多外国诗歌。文学研究会也很重视翻译文学，茅盾主编《小说月报》时，先后刊出过《俄国文学研究》增刊、《法国文学研究专号》、《泰戈尔号》、《拜伦号》、《安徒生号》、《易卜生号》等等，大力提倡翻译文学。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如茅盾、郑振铎、冰心等都积极从事翻译工作。如茅盾翻译的欧美小说和戏剧；郑振铎翻译的《新月集》、《飞鸟集》；耿济之翻译的《复活》、《父与子》；李青崖翻译的《莫泊桑短篇小说集》、《波华荔夫人传》；傅东华翻译的《奥德赛》、《伊利亚特》等等。其译文都是得心应手，文笔美妙之作，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迎。以鲁迅先生为首的未名社对翻译文学的贡献更是有口皆碑。未名社的翻译家曹靖华、韦素园、李霁野等人在鲁迅先生的领导下翻译、编辑、出版《未名丛刊》，专收翻译作品，重点介绍苏俄文学，在中国的翻译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创造社在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方面也不遗余力，郭沫若翻译歌德、雪莱、惠特曼的诗歌的成就是受到读者称赞的。创造社编辑的《创造季刊》还曾刊出过《雪莱纪念号》。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对翻译介绍外国文学著作也十分重视，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人在翻译介绍外国的文艺理论和诗歌方面的成绩卓著，影响深远。

“五四”以后的十年中，我国文坛上的翻译文学非常活跃。从事翻译的人数很多，工作态度大多严肃认真，对原作的选择很谨慎，译文质量也较之上一个时期大有提高。并且扭转了从前着重翻译介绍外国侦探、言情小说的倾向，而开始注意介绍外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三、“左联”时期的翻译文学

从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到1936年初自动解散，这段时间里，翻译文学在左联的领导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34年9月，在上海创刊了我国最早的专门刊登翻译文学作品的《译文》月刊，其编辑工作就是在左联领导下，先后由鲁迅、茅盾指导，黄源先生主持进行的。该刊在传播外国先进文学思想，促进我国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除了创办翻译刊物之外，左联也积极提倡翻译文学并通过各种形式扩大翻译文学的影响。鲁迅先生于1933年在《关于翻译》一文中明确提出：“我们的文化落后，无可讳言，创作力当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较的薄弱，是势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所以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决不可压抑了一面，使创作成为一时的骄子，反因容纵而脆弱起来。”正是由于左联领导的提倡，当时许多作家既从事于创作，也热衷于翻译。老作家鲁迅、茅盾等在翻译实践方面继续作出贡献，他们不只翻译文学

作品，也译介外国先进的文艺理论。瞿秋白同志一面领导党在白区的工作，一面积极写作和翻译，他译的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小说，表现了译者的创造性才华，为文学翻译树立了榜样，受到鲁迅先生的称赞。周扬同志在全力领导左联工作的同时，也为翻译介绍外国先进的文艺理论做了很多艰苦工作，他翻译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和夏衍同志翻译的高尔基的《母亲》，都以其忠实于原作的译文和斐然的文采，受到广大读者的赞扬。其他如冯雪峰、巴金、黎烈文、孟十还、丽尼、周立波、王维克、郑振铎、许地山等译界前辈也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翻译文学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四、抗日战争至1949年的翻译文学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翻译文学主要是在国统区和解放区两条战线上开展的。在国统区，翻译家傅雷、朱生豪、李健吾等都对翻译文学作出过巨大贡献，如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的小说；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的戏剧；李健吾翻译的莫里哀戏剧集等等，都在现代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他们的译著以其感人的艺术魅力和优美的翻译文笔至今还吸引着千百万读者，并且为提高文学作品的译文质量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时期，时代出版社在翻译介绍苏联文学，培养翻译人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解放区，延安曾设有专门的翻译机构，翻译出版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这时期翻译的《马恩列斯论文艺》、《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为我国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创造了条件。还有许多人翻译了苏联的文艺作品，受到全国读者的热烈欢迎。

五、当代（1949年至1966年）的翻译文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翻译工作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央成立了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专门组织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全国成立了许多外语学院，培养翻译人才。例如从延安迁到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就是一所创建较早的培